

Symbols through Time

Interpreting the Rock Art
of Central Asia

穿越时光的符号

中亚岩画解读

[波兰] 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 著

Symbols through Time

Interpreting the Rock Art
of Central Asia

穿越时光的符号

中亚岩画解读

〔波兰〕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 著
肖小勇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解读/(波)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著;肖小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873-1

I. ①穿… II. ①安… ②肖… III. ①岩画—研究—
中亚 IV. ①K883.60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443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穿越时光的符号

——中亚岩画解读

〔波兰〕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 著

肖小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873-1

2019年3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3/4}

定价:42.00元

Andrzej Rozwadowski

SYMBOLS THROUGH TIME

Interpreting the Rock Art of Central Asia

Copyright© Andrzej Rozwadowski 2004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9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东方研究所 2004 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致谢 / 1

第一章 中亚与岩画 / 3

1. 史前史与历史 / 4

2. 研究简史 / 7

3. 最早的岩画 / 11

第二章 印欧人世界 / 19

1. 青铜时代岩画 / 19

2. 印度伊朗人 / 28

3. 印度伊朗人的岩刻 / 32

4. 印度伊朗人的宇宙起源论 / 39

5. “太阳神”之谜 / 51

6. 萨满教问题 / 71

7. 雨在岩石中? / 79

第三章 早期游牧人：鹿与狼的时代 / 83

1. 动物风格 / 84

2. 狼的传人 / 92

第四章 民间信仰与伊斯兰教：老传统与新语境 / 95

1. 纳夫鲁兹与传统延续 / 95

2. 圣景 / 101

3. 圣徒、苏菲教徒与萨满巫师 / 108

4. 穿越时间的符号 / 114

图片 / 117

参考文献 / 133

地名、人名、术语译名对照表 / 145

译后记 / 149

致 谢

本书是波兰科学研究与信息技术部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基金项目（No5 H01G 049 21）的研究成果。它的完成离不开相关人员和机构的支持。首先，我想感谢项目的合作者毛希丁·胡德加纳扎罗夫，他不仅协助我田野调查，而且与克里斯蒂娜一道对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日常生活给予了莫大帮助。此项研究与蒂穆尔·希罗诺夫领导的撒马尔罕乌兹别克科学院考古所合作完成。在历时十年的研究中，亚历山大·科什科、米哈乌·科布什维茨、莱赫·克里扎尼艾克、弗拉迪米尔·库巴列夫、阿列克谢·玛利亚什维、蔡诺拉·斯马什沃、兹·波杜什金、沃齐米日·龙奇科夫斯基以及波兹南史前协会给予了我宝贵帮助。我也非常感谢戴维·惠特利和肯尼思·雷马尔能够阅读本书书稿并给予宝贵意见与语言支持。

第一章

中亚与岩画

几个世纪以来，中亚一直处于联系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十字路口。这种联系既有横向东方与西方的交往，也有纵向“北方游牧”与“南方农耕”的汇合。在古代，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这片地区传播新奇的商品与先进的技术，也使不同宗教信仰得以广泛散播。东方从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里得到启发，而西方则从拜火教及佛教里受到教诲。当今认为中亚地区仅是伊斯兰教统治下的突厥民族国家，这种观点不只草率，而且肤浅。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亚地区融合了多民族、多宗教、多经济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在这一地区漫长的历史中一直相互交织、频繁互动。而这些传统的本质，就是借助于多种媒介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从金属器及陶瓷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曾经在石头表面进行雕刻、绘画的传统，而岩画这种艺术形式从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中亚地区文化景观中以前乃至当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传统这面棱镜，来揭示这一地区岩画图像所以产生的文化根源。

本书岩画图片主要来源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从事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本书对岩画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这两个国家。同时，由于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多次交往以及参阅了相关研究的出版物，所以也会涉及周边地区。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不是编写中亚地区的岩画纲要，而是为大家了解这一区域的岩画传统提供指引。这里所说的文化传统是跨越国界的，我们在这种传统里找寻线索来拼接中亚地区复杂的岩画图像史，尽管这种图像史的复杂程度还未被充分认识到。

1. 史前史与历史

中亚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即“石器时代”初期，与之相关的是直立人（图1）。多年以来，有关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证据，仅限于地面采集到的零星石质工具，因其断代依赖于类型学对比，所以结果并不可靠。最近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中亚地区人类起源更新更丰富的信息，而且也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年代数据。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库尔达拉（Kuldara）遗址被认为是中亚最古老的遗址，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Kasimov 1990）。哈萨克斯坦南部和土库曼斯坦地区也有众多阿舍利文化遗址为人所知（Kasimov 1990）。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温古尔（Siel-Ungur）洞穴发现的文化遗存最早距今五十万年（Islamov 1984）。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区的乌奇图特（Uchtut）发现了500多件石制工具。而乌兹别克斯坦库尔布拉克（Kulbulak）遗址的考古发掘，划分出49个地层，揭示了复杂的文化序列：从最早的阿舍利文化综合体（与直立人相关联）到莫斯特文化（与尼安德特人有关，一般认为大约出现于10万年前），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约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被现代人即晚期智人所取代）。在锡尔温古尔洞穴发现的早期人类骨骼，包括十颗牙齿和一片上肢骨，属于尼安德特人，特征比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发现的著名的“特锡克塔什（Teshik-Tash）人”还要古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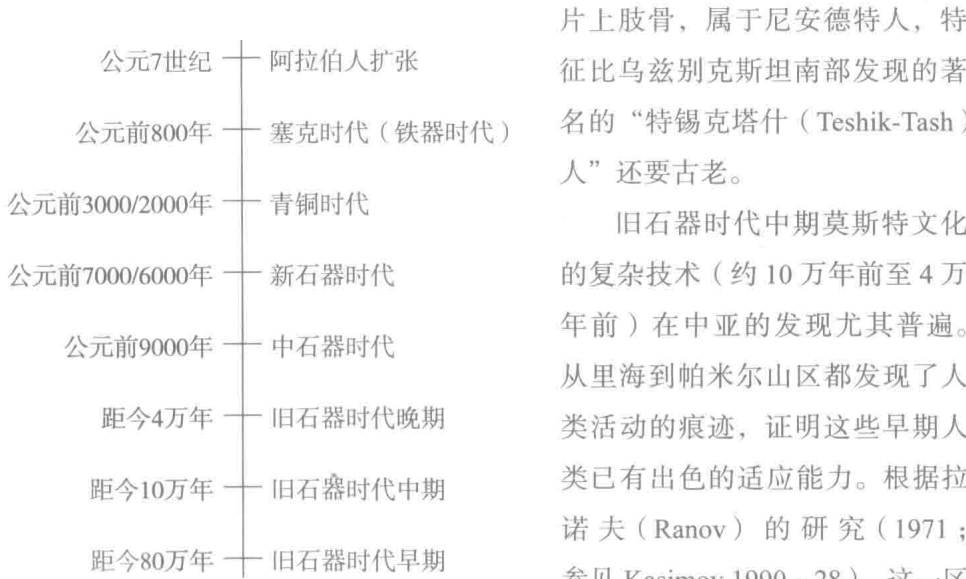


图1 中亚的史前时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复杂技术（约10万年前至4万年前）在中亚的发现尤其普遍。从里海到帕米尔山区都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证明这些早期人类已有出色的适应能力。根据拉诺夫（Ranov）的研究（1971；参见Kasimov 1990：28），这一区域的120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有



图2 乌兹别克斯坦特锡克塔什洞穴

超过半数属于莫斯特文化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考古学家在特锡克塔什洞穴（图2）里发掘到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儿童墓葬，里面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头骨（Okladnikov 1966b）。儿童骨骼周围插着一圈山羊角。

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相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相对不太常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舒格诺乌（Shugnou）遗址，位于塔吉克斯坦亚克苏（Yaksu）河上游。舒格诺乌遗址有四个地层，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猎人使用过的石器（Ranov, Nesmeyanov 1973:83）。出土器物最丰富的当属撒马尔罕（Samarkand）遗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Djurkolov 1987）。除约400件石器工具和人骨碎片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赭石片（Kasimov 1990），表明可能有墓葬。尽管在最早期还没有艺术品，但是赭石和特锡克塔什尼安德特人墓葬的发现，就表明了中亚地区早期人类已具有象征行为。学者们认为这些发现反映了早期人类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生命的信仰。

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中亚的生活受到新的影响，开始分化为北方和南方两个重要区域。尽管这两个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但是

文化影响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区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南方农业区”和“北方游牧区”。中石器时代末与新石器时代初（公元前 7000—前 6000 年），这种分化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地区受到早期近东农业文明的影响。中亚的这种新石器文化特征鲜明：农耕、家畜饲养、制陶以及泥塑女俑艺术。尤其是泥塑女俑，将中亚与流行这种传统的近东新石器时代联系起来。就这种艺术而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霍加肯特（Hodjiakent）的一些岩画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描绘女性形象的例子（Hudjanazorov 1995）。

公元前六千纪，土库曼斯坦科佩特达格（Kopet Dagħ）高地的杰伊顿（Djeitun）文化出现了中亚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迹象。杰伊顿遗址位于阿什哈巴德以北 30 公里，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由长方形单室房屋建筑群构成。公元前五千纪初，“杰伊顿人”掌握了红铜开采和加工技术。聚落形态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开始出现纳马兹加泰佩（Namazga Tepe）和卡拉泰佩（Kara Tepe）这种面积超过 100 公顷的大型城镇。公元前三千纪末，中亚南部发生了一次波及整个地区的大变迁，早期城镇衰落，人口分布变得更加分散。这种突发的危机影响了众多的文明中心，诸如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伊朗东北部的泰佩希萨尔（Tepe Hissar）和图尔干泰佩（Turgan Tepe），以及科佩特达格平原的大型聚落纳马兹加泰佩和阿尔廷泰佩（Altin Tepe）。公元前二千纪初，新的考古学文化开始出现，标志着早期铁器时代的到来。

然而此时阿姆河流域以北的文化习惯上仍然只被定义为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社群直到青铜时代（公元前二千纪）仍然延续着狩猎和采集的生计方式，而且只有陶器的出现才将这一地区与新石器文化关联起来。我们只有在所谓“草原青铜社会”这个语境中，才能首次肯定地谈到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农耕经济，这就是考古学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由于这一时期的相关文化现象为解读岩画图像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详细讨论。

这种南北文化区域的分化很重要，而且在整个中亚历史上都可看到这一点，虽然其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一直向北推移：早期在阿姆河，公元前一千纪时向北移至锡尔河。锡尔河成为游牧部落的传统边界，一切来自南方的扩张也终止于此。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帝国的扩张不曾越过锡尔河，两个世

纪之后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没有跨过锡尔河，因为对于他们的军队来说，游牧的塞人（塞克-斯基泰人）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屏障。公元7世纪，向北扩张的阿拉伯人也止步于此。当阿拉伯人将中亚南部大地带入伊斯兰文明体系时，北方地区就变成了突厥部落的领地，简单来说，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从那时起就形成了。

语言是区分中亚各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如前所述，这个地区当代的“突厥特征”仅是其特点之一。实际上，讲突厥语的民族（卡拉卡尔帕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占据主流，讲伊朗语的塔吉克人仅是特例。但是目前这种突厥语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在早期历史阶段并不存在。从未有过一个族群完全被另外一个族群所驱离，也不曾有过一种信仰体系被另外一种信仰体系所彻底取代。因此中亚文化丰富而复杂，包容了不同的民族和宗教。而这种同一时期的文化融合既适用于讲突厥语的民族，也适用于讲伊朗语的民族。考察过中亚的考古和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将探讨这一地区岩画研究的现状。

2. 研究简史

中亚地区的岩绘和岩刻多见于山区。大体上根据所处山脉或集中分布的河流划分岩画系统（图3）。在第一部关于该地区岩画的综合性著作（Sher 1980）中，具体分为两大岩画系统：帕米尔-阿莱（Pamiro-Alai）岩画系统（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天山（Tien Shan）岩画系统（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中国西部的新疆）。后者北部以萨彦-阿尔泰（Sayano-Altai）岩画系统为界。萨彦-阿尔泰岩画系统一直延伸至内亚（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西部）。在现在中亚的行政边界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印度河流域上游（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其岩画与中亚的文化景观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佛教传播方面，佛教沿兴都库什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峡口从印度和巴基斯坦传播到新疆。这些道路沿线现已发现众多具有佛教主题的岩画遗址。遗憾的是，土库曼斯坦少有岩画见诸报道（Ksica 1972）。但若考虑到土库曼斯坦周边国家都有大量岩画存在，则完全有理由相信，土库曼斯坦岩画的潜力只是尚未被充分认识到而已。



图3 本书涉及岩画群及主要岩画遗址分布图

研究的肇始

关于中亚岩画的信息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初。1805 年 G. I. 斯帕斯基 (G. I. Spaskii) 临摹了斯莫利安卡 (Smolianka) 河的岩绘画, 并于 1818 年首次发表了对这个遗址的记述。斯莫利安卡河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 是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从此开启了整个 19 世纪旅游者及探险者搜集中亚不同地区岩画遗址信息的先河。19 世纪末, 一些早期调查者成为当时成立的俄罗斯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和突厥斯坦考古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包括: N. A. 纳斯列多维 (N. A. Nasledovii)、N. S. 雷科申 (N. S. Lykoshin)、D. M. 格拉梅尼茨科夫 (D. M. Gramenitskov)、N. I. 韦谢洛夫斯基 (N. I. Veselovskii)。这些探索的成果于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陆续发表。

1902 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 N. G. 赫卢多夫 (N. G. Khudov) 在中亚发现了最有趣的遗址之一塞马里塔什 (Saimaly-Tash) 遗址, 该遗址离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很近, 位于天山西部的费尔干纳山中。这一发现引起上述机构和俱乐部成员对岩画研究的浓厚兴趣, 并于 1903 年组织 I. T. 波斯

拉夫斯基 (I. T. Poslavskii) 探险队前去调查 (Kabirov 1974; Martynov, Mariyashchev, Abetekov 1992)。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可以称为岩画研究史上的“收集者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仅局限于简单描述已发现的岩画图像,偶尔做一些描摹,尚未触及年代学及岩画阐释的问题。

建立方法论基础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发现了一批新的岩画,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岩画年代学问题。D. N. 卡什卡列夫 (D. N. Kashkarev) 和 N. 科罗温 (N. Korovin) 于 1923 年记述了一批有人物和山羊图像的岩画遗址,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岩画遗址的年代属于马格德林时期 (Magdalenian) (旧石器时代晚期)。1939 年, M. E. 沃罗涅茨 (M. E. Voronets) 和 T. V. 奥博尔杜耶娃 (T. V. Oboldueva) 发现了两处有趣的遗址: 苏拉提塞 (Suratysai) 和奥赫纳 (Okhna)。他们着重分析了岩画年代、风格、腐蚀程度及雕刻方法这样的问题。通过这些观察,沃罗涅茨把这些岩画按年代分为三组: 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 (塞克-斯基泰 Sakko-Scythian) 和更近的 19 至 20 世纪。同时, G. V. 帕尔菲奥诺夫 (G. V. Parfenov) 也写文章宣传乌兹别克斯坦苏拉提塞河谷的岩刻画。根据帕尔菲奥诺夫的报道,苏拉提塞遗址的岩刻图像有 1000 多幅,主要为山羊、马、熊、牛、骆驼、豹、狼和狗等动物图像。他还认为苏拉提塞遗址中有旧石器时代的猛犸象和野牛的图像。不过后续研究纠正了他的结论:“猛犸象”可能是马,“野牛”则是近代游客所刻,而岩刻画总数仅略超过 200 幅 (Hudjanazarov 1985)。

1939 年,乌兹别克斯坦南部 (帕米尔西部) 的扎拉乌特卡马尔 (Zaraut-Kamar) 洞穴发现了岩绘画。当地一位猎人告诉了苏尔汉河 (Surkhandaria) 博物馆馆长帕尔菲奥诺夫 (Parfenov) 有关岩绘画的情况。但是这些岩绘画有可能最初是被一名军队的地形测量员发现并记录下来的 (Formozov 1959)。帕尔菲奥诺夫于 1940 年至 1945 年间组织了几次扎拉乌特 (Zaraut) 河谷的考察,使这一区域受到科学界的关注。洞穴里的主要岩绘图案是人、公牛和少量几何符号。这些岩绘画的年代被认为属于中石器时代,即公元前九至七千纪 (Korobkova 1989),或者中石器时代和新时代之交。扎拉乌特卡马尔洞穴岩绘画通常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岩绘画,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进一步讨论。

到 1947 年,有关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岩画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问世(Chernikov 1947),同时,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发现了岩刻画(Margulan 1948)。十年之后,又有两处独特的岩刻集中地被发现,本书后文将深入分析。第一处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塔姆加雷河谷(Tamgaly Valley),A. G. 马克西莫娃(A. G. Maksimova)于 1957 年最先调查(Maksimova 1958)。第二处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努拉套(Nuratau)山脉中的萨尔米什河谷(Sarmish Valley),是乌兹别克考古学家 I. 穆罕默多夫(I. Mukhammedov.)一年后发现的。从题材、时间跨度及图像数量来看,这两处岩画集中地在中亚岩画遗址中都是最丰富的。塔什肯巴耶夫(Tashkenbaev)最先刊布了萨尔米什岩刻(1966),尽管卡比罗夫(Kabirov)(1976)提供给我们更完整的图像。卡比罗夫认为,最早的岩刻画创作于红铜时代晚期(公元前四千纪)和青铜时代(公元前三至前二千纪)。随后几年,卡比罗夫(1974)在努拉套山区发现了更多新的岩画遗址,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Bukhara)、撒马尔罕(Samarkand)、费尔干纳(Fergana)和塔什干(Tashkent)地区调查了一些岩画遗址。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亚各地发现了大批岩画遗址。这样的发现至今还在继续。

岩画研究的新阶段

Y. A. 舍尔(Y. A. Sher 1980)的杰作《中亚和内亚岩刻》(Petroglify Srednei i Tsentralnoi Azii)的出版是中亚岩画研究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这本著作成为该地区岩绘画和岩刻画的知识纲要。这本书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了受到俄罗斯符号学派推崇的方法论基础。舍尔(Sher)关于岩画分析和阐释的观念受到该领域学者的广泛欢迎。除了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20 世纪末也出现了关于特定地区的更深入的综合研究。Z. 萨马舍夫(Z. Samashev)1992 年出版了关于额尔齐斯(Irtysh)河上游岩画的综合研究;同年有关塞马里塔什岩刻画的最新综合研究也出版了(俄文版: Martynov, Mariyashev, Abetekov 1992; 法文版: Martynov, Mariachev, Abetekov 1992);三年后有关天山西部岩画的综合研究也出版了(Hudjanazarov 1995)。合作出版的《中亚岩刻》是舍尔调查的重要跟进之作(Tashbaeva, Khujanazarov, Ranov, Samashev 2001),这本书报告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新的岩画研究。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国际交往和新的国际合作项目。比如,20 世纪 60 年

代早期, M. 克西卡 (M. Ksica) 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的塔姆加雷遗址, 并在德文科学刊物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Ksica 1963, 1969)。通过之后几位国际学者 (比如, Davis-Kimball, Martynov 1993; Davis-Kimbal 1998; Francfort et al. 1995; Koško, Shirinov, Rączkowski 1997; Francfort 1998; Rozwadowski, Koško, Dowson 1999; Lymer 2000; Rozwadowski 2001, 2001a; Rozwadowski, Koško 2002) 的努力, 中亚岩画进一步为西方所知晓。这些以及其他的国际接触, 不仅使得该地区的岩画被世界“重新发现”, 而且开创了关于岩画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信息流。他们还激发了如何记录和保护这些重要考古遗址的新对话。

以上关于中亚岩画研究历史的概括, 说明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画集中地之一。两个世纪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岩绘和岩刻遗址, 尽管具体数目难以估量。仅乌兹别克斯坦就已知有 146 处岩画遗址, 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就有超过 70 处遗址, 同时,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已知至少有几十处遗址。从各岩画遗址发现的单个图像的数目来看, 多数图案有成百幅, 有一些则有数千幅。比如, 仅塞马里塔什一处, 就记录有近 11500 幅岩画画面, 而每一幅岩画画面又有几个或几十个单体图案。

3. 最早的岩画

有几处中亚岩画遗址被认为早于青铜时代, 因此被认为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扎拉乌特卡马尔 (Zaraut-Kamar) 遗址 (图 4)。扎拉乌特卡马尔岩绘画绘于一处小岩洞 (约 3 米高, 5 米宽, 2 米深) 的北壁和西壁, 岩洞开口朝东。福尔莫佐夫 (Formozov 1965, 1969) 将现存的岩绘画按年代分为三组, 其中人、公牛、山羊和狗属于最早的一组 (图 5; 照片 3, 4)。他认为几个简化的人形图案和一个内填小点并被一条直线分隔的圆形图案是晚期的。阿拉伯文题词是最晚的, 根据马松 (Masson) 的判断 (基于古字体分析), 属于 10-13 世纪 (Formozov 1969: 66)。

由于出现公牛的岩画场景中并没有农耕和畜牧主题, 因此这些岩画被认为创作于石器时代。又因为其中还绘有一把弓, 而弓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尚未出现, 所以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岩洞距河谷底部有 8 米高, 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观察动物进入峡谷的理想位置。岩绘画中人的身体形状大致呈三角形, 类似于



图4 扎拉乌特卡马尔洞穴附近河谷

装扮成鸟的人的剪影。这是将这些岩绘画解释为表现狩猎巫术的基础，狩猎巫术是当时解释岩画起源和含义的常见的理论。这些岩绘图画后来被认为是猎人把自己伪装起来以便更容易地接近野牛，而这同时也佐证了这些岩绘画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判断。

这种解释被认为得到了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帕米尔高原地区（海拔约 4200 米）的沙赫特（Shakhty）洞穴中发现的古老岩绘画的证明。这处遗址是拉诺夫（Ranov 1961）于 1958 年发现并分析的，但无后续研究。拉诺夫摹绘了三幅用线条勾勒的颇具争议的动物图像（图 6），虽然他们极有可能是野猪或熊，和一幅人形图案。拉诺夫认为人形图案类似一个伪装成鸵鸟的人（这被认为佐证了扎拉乌特卡马尔岩画中发现的“鸟形人”的古老）。几何形符号看起来像箭，位于一头野猪或熊的上方。拉诺夫曾经从欧洲旧石器洞穴艺术中找寻可以类比的图像。然而沙赫特岩绘画非常独特，与其他中亚晚期岩画也完全不同。因此，在洞穴里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中石器时代工具，就成为将这些岩绘画年代断定为中石器时代（公元前九至前七千纪）的主要依据（Korobkova 1989）。